

【文化杂谈】

从读书会说到雅集

□孙葆元

接到国杰文化沙龙的邀请,希望我去讲一讲。讲什么呢?他们说,讲讲当下热门的文化话题。这是一个由专业法律人士组织的文化沙龙,我很好奇,决定去拜会一下,不能空着手去,那天带去的题目是“当代诗词应该长什么样”。传统文化受到重视,古体诗词勃兴,然而,这种体裁曾经“断代”,如今重新拾起,后学诗人们却不知道如何剪裁它,于是,模拟古人情感的有之,口号代入式的有之,在格律和声韵上混淆迷惑的有之。这是诗的问题,也是中华文化如何继承、发扬的问题。

此后我便注意到文化沙龙。所谓沙龙,是文学家、艺术家伴着咖啡、音乐进行的交流,原本是舶来品,把它搬进我们的生活未尝不可,不必咖啡和茗茶。不过,我们这个泉水之乡更喜欢把它叫做“读书会”。近年来,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,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群体。我在几个文化群中徜徉,不时就看到一些读书会举行专题讲座的公告,有点像大学校园里的公共课,把广告贴出来,通知同道者参与、品鉴或切磋。读书会民间的文化活动,没有什么考勤之类,却吸引得读书人踊跃参与。在读书会聚首的不独是读者,其实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作家、艺术家,为着一个专题坐到一起,共同讨论某一文化问题,相互借鉴,互取短长,既是别人作品的读者,也是为社会提供作品的作家。读书会就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平台,既可由一群坚定者不舍昼夜地守护,也可因一个题目走到一起,不能不说是近年涌现的一种文化现象。

文化现象是有由来的。在宋朝有一种“瓦市”,所谓“瓦市”是指它存在的形式,人如瓦,聚起为屋顶,不聚则散如瓦片。然而它是一种制度,约定俗成,不必动员,适者从之,乐者由之,世人主动投身其舍。瓦市是一个演艺场,何尝不是一个文化场?读书会当然不是演艺场,但同属文化聚合形态,它演绎着新时期的文化,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需求与发展。常言道,人以类聚,物以群分。这不是贬语。人群就是以志向、喜好走到一起的,为着共同的追求可以从陌路结成同行者;为着一个理想可以聚瓦成顶,共同构成一个大厦。现在的人管这种现象叫“群”,网络上三五好友即可结群,在群内聊天互动,随时呼应。读书者的群就是读书会。

我也注意到,目前读书会信手拈来的选题甚多,缺乏专题性,比如研究某一种体裁,深入下去,取得较深的收获;又比如研究某一种文化现象,获得自身的提高。文化建设没有专业院所与民间之分,跨行业的读书与写作比比皆是。鲁迅是学医的,却在文学上有巨大的建树。当代作家余华是牙医,他种植的不是牙齿而是为世界奉献出振聋发聩的作品。谁又能预测遍布市井的读书会里会走出什么样的人呢?

读书会与欧洲的沙龙相似,为着文学艺术走到一起,但它的血脉绝不是欧洲的血统。如果从学术或文化形式上研究,它很像中国古老的雅集。雅集是以文会友,是同道相契的聚首。历史上最著名的雅集如西汉时期的梁园雅集,当时的梁孝王刘武召集了最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、邹阳、枚乘、严忌等会集梁园,这些辞赋家创作出《子虚赋》《柳赋》等大量脍炙人口的赋作,把赋这种文体推到巅峰,并影响着后世。

历史上第二场著名的雅集发生在三国建安时期的邺城,当时曹丕召集王粲、刘桢、陈琳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孔融聚于邺都,游宴唱和。其时社会动荡,民生离乱,文化人仕途难酬,需要一个安定的、能施展抱负的社会环境,这次雅集直接催生了建安文学,尤其在诗歌方面,打破了汉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,五言诗兴起,七言诗也奠定了生发的基础,更重要的是建安文学反对绮靡柔弱的文学风气,开创了建安慷慨豪迈的文学风骨。那七位发起者被称为“建安七子”。

还有一次雅集至今被读者乐道,那就是东晋永和九年(353)春天,王羲之在绍兴兰亭举行的雅集,当时集合了谢安、谢万、孙绰、王凝之、王徽之、王献之等名士,聚会的理由是行“修禊”之礼。修禊是在临水的地方消灾灾祸、请祈平顺,他们以流水载觞,以觞载酒,诗酒共飨,得诗三十七首,合成一集。王羲之亲自操笔作序,留下了著名的《兰亭集序》,更留下一代文化人友谊的佳话。而兰亭雅集传承有绪,绵延不绝,形成一道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景观。

华夏文化史上雅集不胜枚举,白居易晚年隐居香山寺,与六位耆老发起雅集。面对滔滔伊河,河那岸是龙门石窟,他怀念旧友。彼时他最好的朋友元稹已逝,他为元稹写下墓表,元家以重金酬谢,白居易不受,元家执意奉酬,白居易没办法,就用这笔钱修筑香山寺。香山寺就是六位老人的雅聚之所,加上白居易一共七人。白居易将雅集命名为“尚齿七老会”,意思诙谐,是说我们七个人牙齿尚存,老躯尚健。闻听此讯,又有两位“尚齿”者加入,这两位好生了得,一位是叫如满的禅僧,九十五岁;另一位是叫李元爽的隐士,一百三十六岁。“七老会”变成了“九老会”,白居易为他们的人生一会留下诗句:“家酝满瓶书满架,半移生计入香山。”

时光流到宋朝,元祐二年,驸马都尉王洙邀请他的文化朋友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,画家李公麟、书法家米芾共十六位翘楚在他家里诗画抒志,把酒论禅。驸马府邸是西园,李公麟为这次雅集留下名画《西园雅集图》,米芾为画作题写了《西园雅集图记》。

我们看古人的“会”,每一次“会”都留下经典名作。除了雅集者是名家,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专题,反复地阐释这个专题,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敲打,而是在专题的引导下经年探讨,遂成宏业。朱熹建白鹿洞书院,给入院者的告诫是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。回过头来再看我们如今的一些读书会,就会找到发展下去的方向。

还是说到当代诗词的话题,眼下论诗者众多,各种“班”此起彼伏,涌现出很多诗评家,似乎都可以指导后生的创作,给诗词创作打分。须知,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,古老的诗词艺术也应该有新气象,在遵循固有格律的原则下,根据语音变化,在语词更新的环境下推进变革,遵古不泥古,创新不脱律。还是回过头去看看一路铺过来的诗词之路,当代诗词应该长什么样?由一众诗人的创作去回答,而不是所谓诗评家的点评。只有创作实践才是诗词发展的正途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)

□萧萧

秦始皇在沙丘平台驾崩后,丞相李斯为稳定政局,将其遗体放置于辒辌车中秘不发丧。因酷暑导致尸体腐坏,随行官员遂在车内装载一石鲍鱼以掩盖异味。古人所说的“鲍鱼”,原是盐渍鱼的统称,比如“如入鲍鱼之肆,久而不闻其臭”。

在居延汉简的残片上,“鲍鱼”二字与粮秣兵器并列,它是戍边将士的军粮,是穿越河西走廊的商队行囊里的耐储食物。这些被盐粒包裹的鱼干,承载的是生存的智慧,是漫长旅途中的味觉慰藉。

转机发生在唐宋之间。当“鮓鱼”这个名称逐渐被“鲍鱼”取代,它的身份也完成了从市井到殿堂的蜕变。

元丰八年,苏轼在登州出任太守,虽在任仅五日,却与这片海域的珍味——鲍鱼(古称鮓鱼)结下不解之缘。这位深谙人间至味的太守,一改前人仅视其为食材的观念,将其奉为值得大书特书的珍宝。他在《鮓鱼行》中欣然写道:“吾生东归收一斛,包苴未肯钻华屋。”字里行间,透出的不仅是对其丰腴鲜美的贪恋,更有一份如获至宝的欣喜与珍视。

在苏轼眼中,鲍鱼早已超越寻常肴饌。他详考其性,认为它“分送羹材作眼明,却取细书防老读”,深信此物有益精明目、延年防衰之奇效。于是,品味鲍鱼,于他而言不再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,更成为一种融合养生之道与文人雅趣的精神体验。自东坡一咏,鲍鱼在北宋士大夫圈中的意蕴悄然升华。它既是宴席上的珍馐,亦是文人交往中堪比金玉的雅赠;它所承载的,不再仅仅是海洋的鲜味,更浸润了士人阶层对生活品质的讲究,对健康长寿的追求。

至清代,随园老人袁枚在其饮饌经典《随园食单》中,以食家笔法精确记录了鲍鱼(古称鮓鱼)的烹饪要诀。他直言其挑战在于“其性坚,终不能齿决,火煨三日,才拆得碎”。寥寥数语,道破了顶级美味与极致功夫之间的必然联系——那“三日”的文火慢煨,早已超越简单的烹饪程序,更像是一场关乎耐心与心性的修行。在时光的缓缓浸润下,坚硬的质地逐渐化为绕指柔,成就至高味觉境界。

袁枚笔下并非空谈理论,更佐以生动的食案实例。他提及“杨中丞家削片入鸡汤豆腐”,其上再浇以陈年糟油,清鲜与醇香并重;又记“庄太守用大块鮓鱼煨整鸭”,以鲍鱼之海韵融入家禽之丰腴,谓之“别具风趣”。这两道佳肴,一者精巧细腻,一者豪迈大气,却共同印证了同一条至理:真正的美味,是时间与技艺共同雕琢的艺术品,是耐心守候后自然绽放的华彩。

与鲜鲍鱼食用不同,干鲍的制作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。去壳、清洗、腌制、水煮、晒干——每一步都是对鲜活的重新定义。宋代工匠创造的“低温慢煨——梯度渗透”工艺,让鲍鱼在炭火与高汤的浸润中,逐渐蜕变成“触之如凝脂,观之若琉璃”的“艺术品”。“谭家菜”的红烧鲍脯,将这种时光之味推向极致,张大千称其为美食中极品。“吃鲍鱼边里如啖蜂窝豆腐,吃鲍鱼羹心,嫩似熔浆,晶莹凝脂。”这般描写,已超越美食的范畴,近乎对完美物性的礼赞。

最初的“臭”,是生活的真实;后来的“珍”,是文化的精炼。而连接这两极的,是时间——盐渍保存的是时间,慢火炖煮的是时间,晒干浓缩的也是时间。

我们今日品尝鲍鱼,咀嚼的不仅是胶质饱满的肉质,更是千年来的生活智慧。那一口软糯中,有沙丘道上的仓皇,有汉简墨迹里的日常,有苏轼诗中的欣喜,有旧日宴席上的繁华,也有谭家厨房三代人的坚守。鲍鱼之味,终究是时光之味。它教会我们,最美好的事物,都需要时间的成全。正如人生,所有的咸涩与等待,都可能在某一天化作唇齿间的回甘。

(作者为媒体人、作家,代表作品有《慢煮光阴一盏茶:中国茶人录》等)

【读史札记】

鲍鱼之味